

广东人民出版社

告别万岁

《同舟共进》百期作品选

《同舟共进》百期作品选

告别“万岁”

萧蔚彬

黄伟经

主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何燕屏

责任技编：黄秉行

告别“万岁”

萧蔚彬 黄伟经 主编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厂址：广州市永福路44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4.5印张 2插页 350,000字

1996年10月第1版 1997年8月第3次印刷

ISBN 7-218-02273-1/C·66

5.001—15.000

定价：23.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序

全国刊物成千上万，其中，文艺及各科专业刊物可能占大半，然后是为大众编的通俗刊物。政论性刊物占的比重可能最小，因为太不好编，而编得真有些分量的，寥寥无几。其中，我认为《同舟共进》是编得出色的。

《同舟共进》之所以编得好，在于它不满足于说些不痛不痒的套话，而有时敢于碰碰敏感的但是重要的问题。我每次接到刊物，总掂掂它的分量。我认为《同舟共进》的问世，对近当代史的研究是有贡献的。

《同舟共进》的出版，说明九十年代的中国不但在对外经贸上开放了，国内言路也比以前宽敞了。这是盛世现象。《同舟共进》出了一百期，并还将出下去，这也说明编者责任心强，既撒开网来组稿，又懂得慎重和节制。

萧 乾

1996.1.12

目 录

李锐与《庐山会议实录》	张 扬 (1)
见苦瓜如对老友	李 锐 (33)
中南海的两次周末晚会	崔 英 (38)
不准讲话记	吴有恒 (47)
史学家之困惑	吴有恒 (50)
南柯噩梦	萧 乾 (57)
赶集	牧 惠 (65)
我的“少小离家老大回”	魏中天 (70)
王匡家的老阿婆	沈 容 (73)
一个奇怪的电话	沈 容 (77)
周培源与三峡工程论证	田 方 (81)
从《李宗仁归来》到《梁漱溟问答录》	汪东林 (96)
《丑陋》的风波	牧 惠 (118)
特区的由来	王扬泽 (126)
中山陵前的沉思	胡绩伟 (133)
关于社会主义前途的对话	吴 江 (141)
二十世纪社会主义的新发展	吴 江 (159)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纪事	沈宝祥 (171)

评“红”长简	邵燕祥 (193)
从嬉皮士向雅皮士的过渡	毛志成 (210)
时代呼唤着社会主义民主	曾理 (217)
肃贪：一个严峻的话题	罗康宁 吴世宦 (221)
对近代中国科技落伍的反思	黄世瑞 (232)
一个中国记者对二次欧战的观感	萧乾 (240)
从日本投降说到原子弹	若水 (251)
靖国神社——日本人的灵魂负担	李明伟 (258)
撒谎与赖帐	冀沅 (264)
雅量与胆量	马为民 (267)
把脑袋还给我的 CNN	蒙思 (271)
忆苦思甜在美国	蒙思 (274)
“毛主席，为什么您的牙齿是黑的”	林秀一 (278)
与胡耀邦最后一次晤谈	吴江 (286)
同耀邦的诗交	李锐 (292)
彭德怀也是一位政治家	李普 (297)
真善美的人格	杨天堂 (300)
林语堂与《枕戈待旦》事件及其他	陈封雄 (310)
新生诚不易 六载常追忆	李以助 (320)
两个“老少年”和一位忠厚长者	廖冰兄 (327)
从“野生动物”到“珍稀动物”	廖陵儿 (336)
辨才试玉十年期	许桂桑 刘思考 (343)
告别“万岁”	李普 (352)
说左与“左”	于光远 (355)
话说一分为三	吴有恒 (358)

矫枉必须过正么	吴有恒 (360)
中国需要哲学家	吴有恒 (362)
写于反腐败声中	邵燕祥 (365)
中国人全都堕落了么	邵燕祥 (373)
关于《曾国藩家书》	严 秀 (378)
六十年的变迁	朱 正 (381)
论老婆的用处	朱 正 (385)
推倒“大观园”	毛志成 (388)
对一种潜在危险的断想	李冰封 (395)
又说长城	牧 惠 (402)
嘲李生文	章 明 (405)
答棍公嘲	李汝伦 (407)
漫话“旗军”	吕 匹 (410)
群言之要与群言之难	杨天堂 (413)
“脱贫”者说	杨天堂 (417)
从袁木“听来的故事”想起的	杨天堂 (419)
玉石自焚究可哀	杨奎章 (423)
呼唤新世纪的英雄	湛 震 (428)
一个时代的“精神遗嘱”	舒 展 (434)
批评罗曼·罗兰	赵 牧 (441)
“作嫁衣者”言	杨 蔚 (446)
编后记	(454)

张 扬

李锐与《庐山会议实录》

初次见到李锐

我第一次见到李锐，是1985年春在北京崇文门一家部队招待所中。

一位平江籍老将军，正直敢言，屡屡“犯上”，长期受压挨整；1959年他又向中央上书反映“大跃进”真情实况，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文革”中更成为“彭黄死党”，遭批斗囚禁。八十年代初他来到北京后，仍凄凉惨切，一直栖身于招待所。我结识这位老同志后，常去看看他。这天夜里在他屋中遇见几位客人，有光明日报一位记者，外交学院一位副教授，还有一对上了点年岁的夫妇……

将军介绍：“这是李锐同志和夫人。”

啊，李锐！

平江县东乡森林茂密的崇山峻岭中坐落着一个名叫长寿街的集镇。将军是长寿人，李锐也是长寿人，他俩是战争年代在热河相识的。

李锐是湖南人，我也是湖南人，因此，话题自然多些。我告诉他，湖南很多人欢迎他，但也有一些人讨厌他；前些年传闻李锐可能回湖南任省委第一书记，某些人非常紧张……

“让他们放心吧，”李锐微微一笑，“我都68岁了！”

我谈起湖南某几位曾与李锐共过事的老同志的近况。李锐听得很仔细，偶尔插话询问，流露出真挚的关心。

我在北京，形形色色的“夫人”见多了，老实说，素质高、气质好的很少。中篇名作《人到中年》，正是根据这一点塑造出那位“马列主义老太太”的。但是，李锐夫人显然不同。她端庄文静，举止得体，待人和蔼，经常面含浅笑，对每个人的谈话都认真倾听，却从不插嘴。我和妻子注意到李锐夫人身材适中，皮肤洁白，五官清秀，看得出年轻时的美丽……

李锐自称68岁，看上去年轻些，约60岁上下；夫人比他似乎小10来岁……

我问：“你们是元配吗？”

“不是。”李锐摇摇头。

别人叫他李部长，我称他“李锐同志”。

李锐的面型富于雕塑感，方脸膛，宽额头，高鼻梁，嗓音浑厚，身材高大魁梧……

他稳健持重，给人一种不苟言笑的感觉。

离开招待所回家的路上，我说：“李锐仪表堂堂，年轻时是个美男子。”

妻子笑道：“现在也是！”

我想起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谁说人不可貌相呢？其实人往往是可以貌相的！

李锐来电话

自1985年以后，我与李锐只在几次会议上相遇，有时打招呼，有时连招呼也没有机会打。只有一次例外：1993年3月11日清晨我还躺在床上，便被电话铃闹醒了。一听，是李锐打来的。

“你看了昨晚的电视吗？”他问。

“没有——什么事啊？”

“《穷棒子王国》案判了，昨晚新闻联播节目报道了。”

“怎么判的？”

“王国藩胜诉，古鉴兹和作家出版社败诉。”

“是吗？”

“是呀！王国藩干了很多坏事，中组部当年参与了对他的调查处理……这种人怎么居然‘胜诉’了呀！”

“现在坏人胜诉、好人败诉的事越来越多，而且对这种无法无天的现象毫无制约机制。”我说。

“唉！”李锐叹息。

“今年是毛泽东诞辰100周年，‘凡是’派们又想趁机做做文章。王国藩是毛泽东当年树的典型，因此，不论此人后来怎样败坏堕落，‘凡是’派们都认为袒护了他就维护了毛泽东的形象。此外，北京有些干部是河北人和遵化人，他们与王国藩之间究竟有些什么关系，发生过一些什么事情，只有天知道！”我想了想，又说：“您是研究毛泽东的专家。您比谁都明白，维护毛泽东伟大形象的最好方式，就是像他那样严惩腐败堕落分子，而不是相反！”

“是啊！”李锐感慨道，“还是小平同志讲的对：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

这次电话之后，我像从前一样，不断看到李锐的各种文章和著作问世。但真正使我怦然心动的，是1995年春在书店看到的《庐山会议实录》新版本。这本书曾于1989年5月由春秋出版社和湖南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影响很大；我读过此书片断，但未读全书。我是搞文学创作的，对党内斗争和政治斗争不想作“专门研究”。但后来我的思想有了变化，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再次强调“发展是硬道理”和“主要是防‘左’”后，我更觉得有必要“补课”，而《实录》无疑是“补课”最好的参考书。比起原版本来，新版本明显增厚了，封面和封底图样都变化了，出版单位也改作河南人民出版社，且不是再版和多次印刷，而是“1994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我打电话询问李锐。他解释，新版本增添了几万字，作了许多修订……

翌日我便跑到那家书店，《实录》却已经卖完了。以后20多天跑了十几处书店书摊，都说卖完了。我托熟人帮忙买，最后是人民日报一位朋友在报社大门对面买到一本。

庐山会议与我

我是1959年升入高中的，学校在长沙城郊。庐山会议正是那年召开的，疾风暴雨立刻袭来：“彭黄张周”四人中有三个湖南人，周小舟还是庐山会议前的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除了周小舟外，湖南省委内还有一大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因庐山会议而有了“问题”的人……

总之，湖南成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重灾区”，必须严加整肃。我所在学校礼堂每天从早到晚开斗争大会，口号喊得震天价响，挨批斗被打倒的都是附近农村的基层干部，还有我

们学校和其他中学的领导。

“反右倾”斗争取得了伟大胜利，打倒了许多干部，开除了许多党员。接着，这种伟大胜利的后果很快显示出来，那就是大饥荒。附近农村很多人饿死了，我们这些青少年的成长发育受到很大影响，说直些就是摧残！

残酷的现实教育了某些当权人物，错误被部分纠正，“苦日子”在延续三年后终于过去。但年轻的我并没有停止思索：明明是路线错误造成的严重恶果，为什么归咎于或把口径统一于“三年自然灾害”？还有，几百万“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一风吹地平了反，为什么“彭黄张周”不能平反，排山倒海般的事实不是早已证实了他们在庐山上的直言和预见吗？！

庐山会议后一段时期，恰逢我从少年进入青年，正在形成独立的人格和世界观；那段时期发生的大量的无情的事实，促使我深思和早熟。

正是因为这一点，后来的“文革”一开场我便充满怀疑和抵触，从而没有堕落为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和王大宾那样的人。这些“小将”中，我最憎恶的是韩爱晶；这种憎恶至今未减，憎恶之缘就是他对彭总的残害！

1978年底彭总平反，黄克诚同志发表长篇纪念文章。我至今记得那篇文章的第一句：“历史是这样的无情和公正！”

那句话顿时使我泪流满面……

后来，我第一次会见外宾时，对方问起我对中国当代伟人的评价。我答：“就人格而言，中国当代头号伟人是彭德怀！”

……

总之，庐山会议及随后发生的一切，极大地影响了整个中国社会历史的进程，也极大地影响了乃至“铸造”了我。只要我还想做一个正直的中国人，还对自己的国家和人民有责任感，我就不能忘记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首先是1959年庐

山会议后的历史；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应该了解庐山会议本身——我相信，很多人同我有一样的想法，一样的要求。

然而，关于庐山会议，各种文件、决议很多，笼统的、“原则”的说法很多，实际的、现场的、直观的记录却很少。而只要没有这种第一手的材料，人们的体会就不会深刻，历史的教训就会随时间推移而冲淡乃至湮灭。参加过庐山会议的人有不少已经死去，但也有很多人健在，或虽然谈不上“健”却仍然活着，至少还能回忆、讲述或写作；但是由于种种不难想见的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之中一些人当年在庐山上的表现并不怎么光彩，对后来的灾难或多或少都应承担些责任——因此，他们都不想、不说或不写。

李锐成了他们之中的例外，《庐山会议实录》也就成了那个重大历史事件唯一实际的、现场的、直观的记录。

我读《庐山会议实录》

读着《实录》，我忍不住给李锐打了个电话。

我告诉他，1959年我才15岁，那以前和那以后相当一段时期内，部长、省委书记和中央委员这个层次的人物，在我和一般干部群众心目中几乎都是楷模、偶像、完人、圣人，纯粹的马克思主义者，等等。现在看来，这种看法虽然不准确，但仍然应该承认他们都曾是革命者，都有相当高的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在对敌斗争的艰苦岁月中都有不平凡的经历和贡献，都是出类拔萃的人物……

然而就是这样一些堪称杰出的人物，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在庐山上的表现却那么猥琐！他们或根本不了解人民疾苦和真情实况，或明明了解情况却装作不知，在无形的指挥棒下完全丧失了起码的人格、操守和良知，起劲地颠倒是非，混淆黑白，

见风驶舵，落井下石，拍桌打凳，装腔作势，哄闹围攻，残害忠良，不但在当时铸成一大冤案，尤其贻害以后，导致“左”灾泛滥，造成千百万人的饥饿死亡，更为“十年浩劫”埋下契机……

李锐倾听着，轻声道：“有什么办法，这就是历史，有什么办法！有些情况，我还不能不笔下留情呢。”

我说：“这我能看出来。”

在这次通话中，他告诉我，河南人民出版社已经三次重印《实录》；尽管如此，盗版本仍大量涌上市面。为此，出版社不得不在1995年1月9日《新闻出版报》上刊登“郑重声明”，指出正本与盗印本的诸多差别，要求各地新闻出版管理机关和文化市场管理部门协助查办……

《庐山会议实录》引起了强烈的探索欲。

不过我想，要研究这本书，先要研究它的作者。

李锐的青少年时代

长寿街虽处于平江东乡万山环抱之中，却是湘鄂赣三省交界要冲，地灵人杰。中共十三大选出的中顾委委员中竟有四位长寿人：张震（1955年授衔中将，现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志坚（1955年授衔中将，曾任总政副主任），方强（1955年授衔海军中将，曾任海军副司令员）和李锐。此外，最早的同盟会会员凌容众和老同盟会会员、中共早期党员、北伐军师党代表、毛泽东的老师方维夏也是长寿人。著名长篇巨制《六十年的变迁》作者、辛亥武昌首义英雄、中共早期党员李六如原籍平江献钟，那里离长寿不远；李六如与方维夏又都是李锐父亲的好朋友，李六如元配夫人钟桓英又是李锐母亲的好友和同学。长寿为现代中国贡献的其他杰出人物，中共高级干部和解

放军高级将领，更是难以数计。李锐的父亲李积芳生于1882年。北京写真通信社1916年出版《民国之精华》第一辑，收民国初年国会参众两院443位议员的小传，关于李积芳写道：“君秉性诚厚笃实，痛恶浮华，居常以俭约自持，能耐劳苦；与人交直而不数，喜闻谏言。……前清时以湖北仕学馆学员，由张文襄选送日本留学，毕业于经纬学校及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归国应学部试，授法政科举人。辛亥武昌起义，回湘充法制局参事，筹办地方自治，旋组织湖湘法政学校，兼充公立法政各校教员。（民国）二年初，选为众议院议员。”国会解散后，曾到广州参加孙中山的非常国会。

李积芳1905年赴日留学，除辩明志；他与宋教仁同班又同庚，与革命先驱黄兴、陈天华、凌容众等过从甚密，积极倾向革命，拥戴孙中山，成为同盟会第一批会员。

1922年2月7日（农历正月十一），李积芳先生病逝于长沙，时不满40岁。

李积芳夫人李张淑，湖南醴陵人，清末进过新学，懂诗书，性格倔强。丈夫逝世时，她才32岁，大女儿8岁，二女儿7岁，李锐是唯一男孩，不满5岁；还有一个不满1岁的小女儿，不久夭折。李锐后来回首：“在长沙读书的十来年中，维持一家生活尤其是姊弟三人的学费，主要靠借债和变卖衣物，母亲为此而经历的辛酸苦涩，真是一言难尽。”

李锐原名李厚生，生于1917年4月13日（农历闰二月廿二），乳名“明伢子”，由母亲教会1000字后才进小学。李锐说：“我进的私立楚怡学校，二十年代不仅在长沙，甚至在省外也是很有名气的。”名牌学校收费也高，富家子弟多。李锐家境十分贫寒，每年每期为学费发愁，自然没法子与同学们比吃穿玩；但是，“在小学时，我的功课在班上最好（还连跳过两班）。”

因为跳了两班，六年制小学李锐只读了五年，升入楚怡中学。一年后，因顶撞国文老师，转入岳云中学。这也是一所著名的私立学校，位于长沙市北区经武门（抗日战争时期迁衡山县至今），杨开慧、丁玲等二十年代初曾就读于此。

1934年，李锐从岳云中学毕业，考入武汉大学工学院机械系。

李锐后来回忆道：“我在高中读书时（17岁以前）就有些模糊的革命思想，喜看左翼小说，还写过平生唯一的一篇左倾小说……”

然而，那时武汉大学比较活跃的却是右派学生，国民党复兴社分子及其外围组织成员。李锐一进武大立刻接近进步同学，读进步书刊，与右派学生作斗争。不久，北平发生的“一二九运动”，消息传来，李锐积极鼓动学潮，组织游行示威，推动建立武大学生救国会，随后成为武汉秘密学联的负责人。

在校内外救亡活动中，李锐于1936年上半年结识了何伟。何伟1934年末毕业于华中大学，以汉口圣罗以女中国文教师身分掩护从事秘密工作。1936年下半年，李锐觉察到何伟是共产党人，正式向他提出入党要求。后来得知何伟当时也刚入党，可能没有接到在武汉发展党组织的指示，故没有明确表态。

李锐和他在武大最好的朋友谢文耀、杨纯（万国瑞）仍在积极找党。1937年2月的一天，他们3人与另外5位革命青年组建一个自发党组织，称为武汉临时支部，每个人都举手宣誓。后来才知道，8人中有3位当时都有正式党的关系。

但这毕竟只是个“自发党组织”，还得找党。

“武汉临时支部”派遣杨纯、谢文耀和李锐于1937年5月先后去北平，很快找到了党的关系。

从此，李锐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尽管李锐自考入武汉大学不久便积极投身学潮，学业受到影响（李锐自己也说：后来他“根本不上课了，无法应付考试”），但是，从1934至1937年，他毕竟在武大工学院机械系待了3年；特别是有过“理工救国”的初衷——我问：“解放后你转业到工业战线，是不是跟你读过理工大学有关？”他答：“当然。”我又问：“理工专业本质的科学精神和实事求是倾向，是不是对你产生了深远影响，使你在后来‘左’风泛滥的年代坚持了清醒头脑？”

李锐点点头：“对，有很大影响。”

李锐在战争年代

1938年1至5月，李锐在徐州做青年工作。徐州会战后，李锐突围，取道上海、香港，回到武汉，又受长江局派遣，到湖南工作。从1938年7月开始在地下省委组织部工作并兼任青委书记。1939年秋，奉命赴重庆参加南方局青年工作会议，在那里第一次见到从延安来的冯文彬和胡乔木；会后又陪胡乔木等到湖南检查工作。由于身分暴露，不宜继续留在湖南，按南方局指示，李锐同胡乔木一起赴延安，于1939年12月31日抵达。

胡乔木认为李锐有文才，竭力留在身边。原来安排李锐进学校学习的计划，也被胡乔木“取消”了；他当时是中央青委宣传部长，便让李锐在宣传部当宣传科科长。

1941年，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创办后不久，李锐调到报社，担任国内评论工作，写过不少有关解放区大后方的报道、评论和社论，受到毛泽东的注意和赞赏。

日本投降后，大批军队和干部进入东北。1945年11月，李锐抵热河，担任《冀热辽日报》社长（后改名《群众日